

论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

——兼评“政治思想决定论”

杨祖陶

在国内出版的一些哲学史著作中，有的作者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把黑格尔称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哲学家”。他们的这种观点对吗？我认为，他们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下面就来谈谈我的看法。

—

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把黑格尔称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哲学家”的同志们，也许自认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来的，他们只不过是重述了恩格斯的观点而已。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认为，他们的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恩格斯的论述的误解。

我们知道，恩格斯在他的这部著作的一开始就指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革命，象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进行的哲学革命一样，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接着恩格斯就强调说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很不相同的，并且尖锐地提出了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里“竟能隐藏着革命吗？”的问题，这是因为康德、黑格尔等“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①这就是恩格斯这部著作中唯一出现过“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个词的一段话。我们看到，恩格斯在这里并不是给黑格尔哲学下判断，肯定它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而只是陈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即黑格尔哲学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了。恩格斯并且告诉我们，把黑格尔哲学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有两种人：一是当时的“官方”，即普鲁士王国政府；一是当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物，即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两部分人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虽然截然相反，前者“感激”、支持，后者“愤怒”、反对，但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却又是惊人的一致，而且可以说正是这种一致的看法成了他们各自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极不相同的态度的原因。在这两部分人看来，黑格尔哲学完全是一种把普鲁士王国的现存一切神圣化、合理化的哲学，是在哲学上为普鲁士的专制制度、警察国家、王室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祝福和辩护的哲学，是真正的纯粹的“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其中绝不会有丝毫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

普鲁士王国具有危险性和威胁性的东西，即所谓革命。恩格斯明白地表示他不同意甚至反对这两部分人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观点，指出早在1830年海涅就已经看出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里隐藏着革命，并且讥讽他们是由于同样的“近视”（直译是“偏狭”或“局限”的意思）才看不见隐藏在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的。接着恩格斯就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高屋建瓴之势，深刻地分析了黑格尔哲学，揭示出了在黑格尔哲学中为过分茂密的保守方面所隐蔽起来和压倒了的革命实质。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不仅没有认可黑格尔哲学是所谓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意思，恰好相反，他的全部论述的精神实质，正是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揭示这种观点的错误，并以对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对抗这种错误的观点。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在1886年写作和发表的，那时马克思已经逝世了。但是，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对于黑格尔哲学所持的观点，并不仅是他个人的，而是他和马克思所共有的观点。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5月间的通信里可以鲜明地看出来。

1870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人民国家报》上连续刊载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时，对这部著作中提到黑格尔的地方加了一个注释。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附加的这个“纯粹荒唐的”注释十分愤慨，他在1870年5月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关于黑格尔，此人加了这样一个注：‘是比较广泛的读者所知道的普鲁士王国国家观念的发现者和辩护者’……这个无知的家伙不知羞耻地指望仅仅用‘普鲁士人’这个词来摆脱象黑格尔这样的人物，同时使读者误以为是我说的。”^①恩格斯为此坚决要求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一个他自己的声明。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所附加的注的意见，他在5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已写信告诉他，关于黑格尔，如果他只能重弹罗泰克—韦尔凯尔的愚蠢的陈词滥调，那就最好住嘴。”^②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罗泰克和韦尔凯尔都是与黑格尔同时和稍后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学者、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克思把李卜克内西在注中称黑格尔为“普鲁士王国国家观念的发现者和辩护者”之类的言论斥为重弹这帮自由派人士的“愚蠢的陈词滥调”。由此可见，恩格斯十多年后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于“近视的”政府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把黑格尔哲学视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观点的驳斥，只不过是系统地发挥了他和马克思的一贯见解罢了。

也许有的作者会说，他们并不是笼统地把黑格尔哲学，而只是把担任柏林大学教授以来，特别是发表《法哲学》一书以来的黑格尔的哲学评定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并相应地把从这以来的黑格尔评定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哲学家”的，因为正是在他的这部著作中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已经发展到了他一生中最保守的地步了。当然，这可以是作者自己的持之有故的观点，但如果作者认为他们的这个观点是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来的，那就依然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普鲁士王国政府之所以把黑格尔哲学吹捧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而加以支持，自由派之所以把黑格尔哲学列入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而加以反对，他们正是或主要是以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的社会政治观点为依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驳斥他们时，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88页。

就针锋相对地抓住黑格尔《法哲学》序言中那个既使普鲁士王国政府“感激”，复使自由派“愤怒”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从解剖这个命题开始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从而系统地揭露了他们的错误观点和论证了与之正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的。由此可见，恩格斯是不同意把《法哲学》出版以后的黑格尔的哲学评定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

二

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意甚至反对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把黑格尔称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哲学家呢？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激烈地反对他们的朋友和战友李卜克内西重复自由派的这些言论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在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黑格尔哲学究竟是哪一个阶级的哲学，黑格尔究竟是哪一个阶级的哲学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规定是真理呢，还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观武断是真理呢？

黑格尔哲学究竟是哪一个阶级的哲学，黑格尔究竟是哪一个阶级的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回答是一致的。当他们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时，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即贵族阶级的哲学。因为，所谓普鲁士王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而是指采取君主专制政体的贵族阶级专政的封建国家，而所谓普鲁士王国政府也不是如它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似乎是独立于各个阶级的政府，而是由贵族领导的、为大批封建官僚组成的、管理贵族统治阶级共同事务的权力机构，因而也就是贵族阶级中最反动、最顽固的掌握官方权力的统治集团。说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就是说这个哲学是贵族阶级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和需要、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是体现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而又处于无权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思想和情绪的表现。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和整个从文艺复兴时代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一样，“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①由此可见，象“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类名称或概念是同黑格尔哲学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内容或实质不相符合、甚至直接矛盾的，因而用它来指示或标志黑格尔哲学也就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何以反对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或官方哲学的根本原因。

但是，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政府和自由派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根据主要就是黑格尔向当局表示的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崇拜，他自愿以其哲学来为普鲁士王国服务的忠诚，特别是他的哲学所具有的那种非常显著的为普鲁士王国的现存制度祝福和辩护的内容。所有这些难道是不能否认的吗？

当然是不能够否认的。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50页。

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黑格尔在普鲁士王国政府面前的奴颜婢膝和以这个政府的官吏自居的妄自尊大，对于黑格尔哲学为普鲁士王国的现存制度祝福和辩护的内容，进行了最全面、最深刻、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是，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们决不能以黑格尔哲学有为普鲁士王国祝福和辩护的内容为根据，把黑格尔哲学评定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即为贵族阶级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哲学。为什么呢？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内容是不能片面地归结为替普鲁士王国的现存制度祝福和辩护的。凡是读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或本质特征是保守的体系和革命的方法之间的矛盾，从而也都了解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内容无论如何是不能仅仅归结为替普鲁士的现存制度祝福和辩护的。不仅如此，既然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是贯穿在黑格尔哲学的一切方面之中的根本矛盾，那末，甚至就是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社会政治观点，其根本内容也都不能仅仅地归结为吹捧和维护普鲁士王国的现存国家法律制度，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诚然，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曾经尖锐地揭露说：“黑格尔关于‘行政权’所讲的一切都不配称为哲学的分析。这几节大部分都可以原封不动地载入普鲁士法”。^①但是，当马克思进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内容进行批判的科学概括时，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向我们指出：黑格尔的“思辨的法哲学”乃是“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还是彼世，虽然这个彼世不过只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并且针对这点说：“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②这就是说，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尽管为普鲁士王国的专制制度、警察国家、王室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等等祝福过和辩护过，但是他当作最高最完美的国家模式来思考和赞美的，却并不是在德国现存的普鲁士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而是在德国尚未存在而在英国、法国已经存在着的“现代国家”，即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马克思的这个极其深刻的思想，恩格斯以简明易懂的形式告诉我们说：“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③由此可见，象普鲁士王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那样，把黑格尔哲学（其中包括“法哲学”在内）的内容，仅仅归结为对普鲁士现存制度的吹捧和维护，乃是完全错误的，是他们形而上学世界观所持有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的典型表现。

其次，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黑格尔哲学中为普鲁士王国现存制度祝福和辩护的那些思想、观点，也和他哲学中其他所有的思想、观点一样，其真实的性质和内容究竟是什么，是不能由单纯分析这些思想、观点本身而认识得到的，而是只有在把它们拿来同现实的经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加以对照，对它们进行批判的考察之后，才能予以确定的，而也只有进行了这样客观的研究工作之后，才能对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作出科学的规定。十九世纪初期，德国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0页。

经济摆脱了两百多年来停滞、萎缩和倒退的局面而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发展,德国的阶级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但是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当时仍然处在它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阶级”的阶段上。这时资产阶级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实现它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的根本任务——“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①创造物质的经济的条件。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它采取了放弃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政治上同封建势力妥协、全力支持君主专制,以换取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诸种条件的方针。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妥协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势力之间矛盾的消失,相反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剧,资产阶级必然要随着自己经济力量的增长而相应地要求政治上的权力,并以政治权力为杠杆,最后完成对社会的资本主义改造。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具有历史上英、法资产阶级同样具有的反人民性,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而目睹了人民群众勇猛无情的革命行动,又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无能摆脱长久以来德国市民那种依附于王室的怯懦心理,因此,德国资产阶级不仅和过去英、法的资产阶级一样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而且还企图以保留更多的封建残余的办法来说服专制君主自动地变封建的君主国为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显然,只要我们把黑格尔哲学拿来同当时德国的这种现实情况相对照,就可以看出,原来黑格尔哲学中为普鲁士王国现存制度祝福和辩护的那些思想、观点是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而不是在贵族阶级立场上提出来的,它们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思想,而不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和思想。因为,当黑格尔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最完善的政体时,就表明了他祝福和辩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普鲁士王国的现存制度得以永世长存,而是为了普鲁士王国能够自动地由封建君主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总之,黑格尔哲学中对普鲁士王国现存制度的祝福和辩护反映的正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反人民性,以及资产阶级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愿望。因此,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黑格尔哲学都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思想和情绪的表现;换言之,从任何方面来说,黑格尔哲学都是资产阶级哲学,黑格尔都是资产阶级哲学家。象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那样,不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拿来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由此决定的各个阶级的利益相对照,仅根据对黑格尔哲学的片面理解,就或者出于感激而给它戴上“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桂冠,或者出于愤怒而给它钉上“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耻辱牌,他们的这种主观主义和武断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是他们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大暴露。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科学规定正确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属性,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认识哲学意识形态现象的本质的光辉范例。这一科学规定对于我们正确地阐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阶级基础和发展规律,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和革命方法之间的矛盾的社会根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对立的阶级基础,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当李卜克内西不去领会和宣扬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

格尔哲学的这一科学规定，而盲目地去重复资产阶级自由派关于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陈词滥调时，就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有的谴责。列宁十分注意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这个科学的规定，反对把黑格尔哲学评定为所谓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即代表贵族统治集团利益的反动哲学）之类的主观武断的言论，例如，他指出：“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并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①毛主席也很注意反对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科学规定的任何偏向。例如，毛主席就尖锐地批评了“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的观点，指出了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②

在我国哲学史界里，一般说来，大家都是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哲学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科学规定的，也没有谁公开地同意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德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但这并不是说在这方面已经不存在任何的问题了。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我们有的哲学史著作的作者们在论述到黑格尔时，一方面固然说他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代表，他的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又说他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哲学家”，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样一来，同一个黑格尔哲学岂不就同时成了两个根本利益彼此对立的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代表两种根本对立的阶级利益了吗？而同一个黑格尔岂不就同时成了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哲学家了吗？显然，这种看法是很不妥当的，甚至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它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理论相矛盾的，也是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

也许有些作者会说，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明确地说了，《法哲学》一书的出版，才标志着黑格尔已经成了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哲学家和黑格尔哲学已经成了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确，这样的讲法给人的印象是，黑格尔并非同时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的哲学家，而是先本是这个阶级的哲学家，后来又变成了那个阶级的哲学家。这种说法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过得去的，因为个人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是不会影响到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的。要是作者的意思真的就是这样，那末他就应当向读者作出黑格尔从资产阶级哲学家到贵族统治集团哲学家的这种转变的明确的分析，并且对原先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哲学和后来作为贵族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原则上的区别和对立作出适当的说明。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看不见这样的分析和说明，有时作者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法哲学》一书表明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在他晚年已经达到了他一生中最保守的地步这样的话就完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黑格尔后期的保守的社会政治观点的确是他已经成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哲学家”和他的哲学已经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标志，那末照理说作者就应当向读者阐明他的这些观点实质上已经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观点，亦即贵族统治集团的观点了。可是，今个难解的是，作者在论述当中还是把黑格尔的这些观点称为“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难道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竟能成为贵族统治集团的哲学家或贵族统治阶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级的国家哲学的“标志”吗？此外，还必须指出，虽然作者在主观上力图避免黑格尔哲学同时是彼此对立的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显然荒谬的结论，但事实上这个结论如影之随形是他无法摆脱的。这是因为作者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论述中实际上只提出来了，而且也只能提出来一个黑格尔哲学体系，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两个先后原则上不同或对立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来。

也许有些作者会说，他们是认真地承认黑格尔哲学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黑格尔是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的，当他们说到黑格尔哲学成了“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等等时，并没有把它说成是贵族统治集团的哲学的意思，而只是陈述当时黑格尔哲学已经被推崇为或被公认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样一种历史情况，就象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做过的那样。的确，在论述黑格尔哲学时提到这一历史情况，不仅是容许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当然，问题并不在于黑格尔哲学在当时成了公认的“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而在于作者自己对这种“公认”的内容究竟作何估计和持什么态度：它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是赞成它呢还是反对它呢？如前所述，当普鲁士王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把黑格尔哲学称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时，他们也就以此表明了他们对黑格尔哲学的阶级实质的看法，即肯定了黑格尔哲学是为普鲁士王国政府这个贵族的阶级的统治集团服务的哲学。如果作者在叙述这一历史情况时，不是象恩格斯那样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同意甚至反对普鲁士王国政府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看法，那就会是在事实上默认了或同意了把黑格尔哲学看成贵族统治集团哲学的观点。因此，问题倒在于作者为什么不明确地反对把黑格尔哲学评定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错误观点呢？对此的唯一合理的解释也许是：作者自己对于黑格尔哲学是否应该评定为贵族阶级哲学这点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很可能作者一方面的是的确不同意把整个黑格尔哲学评定为贵族统治集团的哲学，另一方面又感到就黑格尔《法哲学》中那些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以及黑格尔本人自愿以其哲学来为普鲁士王国政府服务的立场而言，又难以拒绝说它不是贵族统治集团的哲学。事实上，我认为，这种不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彻底解决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问题的情况，乃是使许多作者一方面说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哲学，一方面又说它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从而在理论上陷于混乱的根本原因。

三

如上所述，我们的一些哲学史著作的作者在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问题上之所以陷于混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甚至包括象对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关论述的误解这样的原因。但是，在所有这些原因当中，归根到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牢固地掌握和坚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当然，在不同的作者那里，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在许多作者那里，很可能是不自觉地接受了错误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的影响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的指导，而在有的作者那里则又完全可能是由于自觉地从某种错误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为指导。然而，不管怎样，只有划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同错误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之间的界限，才有可能正确地解决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的问题，则是毫无疑问的。

大家都知道，在“四人帮”猖狂活动的时期里，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围绕着所谓评法批儒、儒法斗争史等问题，曾经连篇累牍地宣扬过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的谬论，它们给中国哲学史界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对于西方哲学史界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把这些谬论一一加以清算，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工作者的共同的迫切的战斗任务。在这里，我们只提出其中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思想决定论”的谬论来加以考察和批判，这是因为这一谬论同本文讨论的主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原故。一方面，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决定论”的影响下，我们的许多同志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的指导，而在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问题上，陷入了混乱；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个“政治思想决定论”是有的作者在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问题上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的理论基础。

所谓“政治思想决定论”，根据这一理论的提出者的说法，其基本的思想就是：一个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是由他的政治思想决定的，是为他的政治思想服务的；因此，为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学说代表那个阶级，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的政治思想，设法说明他的哲学理论是为他们政治思想服务的。按照这种观点，既然哲学学说的阶级本质是由它所要论证的政治思想所决定的，因此，为了说明它的阶级本质，只消对哲学家本人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就行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把哲学家的各种思想、观点拿来同现实的经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以及各个阶级的利益相对照的问题了。显然，我们的许多哲学史工作者，如前所述，一方面承认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哲学，一方面又感到由于黑格尔的那些为普鲁士王国现存制度祝福和辩护的社会政治思想而有必要说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他们之所以陷于这种混乱，难道不正是接受了这种“政治思想决定论”的影响的结果吗？同时，我们也看到，有的作者那么坚决地断言黑格尔《法哲学》的出版是他的哲学已经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标志”，他们的理论根据不正就是这种“政治思想决定论”吗？不幸的是，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中有的东西如鼓吹君主立宪又不好说成是为普鲁士王国现存制度祝福和辩护，因为作者知道君主立宪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于是，作者在坚决主张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同时，又同样地以“政治思想决定论”为指导，不无矛盾地说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政治思想决定论”不仅必然导致错误的观点，而且也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混乱，这是它的唯心主义本质决定了它非如此不可的。

“政治思想决定论”的提出者虽然用了不少的唯物史观的词句来装饰它，但它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针锋相对的陈腐已极的唯心史观的翻版，这一点是无法掩盖得住的。依据唯物史观，政治思想本身，和哲学思想一样，是第二性的东西，是经济的反映，是必须由经济来说明的。因此，一定的政治思想究竟反映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不能从它本身的分析来判断，而必须以经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为依据，对它进行批判的考察才能予以确定的。既然如此，政治思想本身又怎么能够成为决定哲学思想的阶级本质的东西呢？又怎么能够以政治思想本身作为判断哲学思想的阶级本质的依据呢？这点在本文第二部分谈到应当怎样来判断黑格尔的政治思想的阶级本质时已经论述过了。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一个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之间有密切联系，并不否认有时一个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可以产生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

的影响。但是这终究是第二性的影响，决定哲学思想的归根到底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思想。这是这个问题上唯一正确的唯物主义观点。例如，黑格尔哲学思想最本质的特征——体系和方法的矛盾，当然是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造成的，其中他的政治思想和关于“体系”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最大的直接的影响；但是，在这一切因素中并通过所有其他因素而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的，终究是当时的经济矛盾、阶级矛盾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矛盾地位，而不是政治思想等等。“政治思想决定论”的提出者自卖自夸地说，只有按照他的这个理论来编写哲学史，才不致写出一部资产阶级的“从思想到思想”的哲学史！其实，“政治思想决定论”本身不就是主张政治思想决定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服务于政治思想的“思想决定思想”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吗？按照这种观点只能写出一部“从思想到思想，从概念到概念的哲学史”，即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政治思想决定论”的提出者把一个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仅仅归结为政治思想决定哲学思想，哲学思想为政治思想服务，这也是极端形而上学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仅这两种思想或观点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依据具体情况而彼此不尽相同的。“政治思想决定论”把其中一种，那怕是比较主要的一种联系形式绝对化和模式化，是完全荒谬的。例如，在卢梭那里，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之间当然是有联系的，但是我们能按照“政治思想决定论”的公式说他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决定了他的哲学思想——二元论和唯心论，而他的二元论和唯心论的哲学思想则是为他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服务的吗？哲学史上象这样的例子不是可以随手拈来吗？甚至就拿黑格尔来说，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极其多种多样的联系就无法纳入“政治思想决定论”的那个死板公式里去，而我们也只好学会辩证地思考，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说明事物。例如，恩格斯有时告诉我们：“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①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是政治思想决定哲学思想吧。可是，恩格斯又讲：“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②在这里，似乎事情又颠倒过来了：哲学思想决定政治思想。实际上，“政治思想决定论”的这个死板公式同“四人帮”极力宣扬的“法家政治上先进——哲学上唯物；儒家政治上保守——哲学上唯心”的先验模式完全是一路货色，它们都同样地既是形而上学的，也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哲学史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就是哲学斗争反映阶级斗争并服务于阶级斗争。“政治思想决定论”的提出者使用了主观主义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的手法，以“政治思想”这个概念去代替“阶级斗争”的概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原理歪曲和篡改成了“政治思想决定论”的哲学思想为政治思想所决定并服务于政治思想的公式。哲学斗争反映阶级斗争并服务于阶级斗争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哲学和哲学史领域中的具体化；坚持以这个原理为指导，也就是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坚持唯物主义的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

识论,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政治思想所决定并为它服务。由此所见,“政治思想决定论”的那个公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公式里,阶级斗争既然被政治思想取代了,哲学思想也就成了与阶级斗争无关的东西,既不为阶级斗争所决定,也不为阶级斗争服务,而只为哲学家自己的“政治思想决定论”的这个公式是一个否定唯物主义认识论,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唯心主义公式。可是,这个公式的炮制者却气势汹汹地说,不按照他的这个公式就只能写出一部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政治斗争的哲学史!实际上,他那个公式既然把阶级斗争一笔勾销了,既然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归结成了对哲学家个人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以及两者的联系的单纯分析,那末,按照那个公式写出来的虽然可以是一部不脱离政治思想的哲学史,但却必定是一部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政治斗争的哲学史,这难道还需要什么特殊的证明吗?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南对一个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以及两者的联系进行阶级分析,而又居然能够在那里大谈什么一个哲学家的政治思想代表那个阶级,因而他的哲学思想也代表哪个阶级,那就很明显,在这里,“阶级”、“阶级斗争”等等只不过是一些套语,被当作标签贴到了各种对象上而已。不言而喻,这样的标签不可能指示出对象自身的本质属性,而至多只不过是表现贴标签者自身的某种情绪、倾向或要求罢了。难道给黑格尔哲学贴的那张“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的标签不正就是这样的吗?

总之,“政治思想决定论”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伪装起来的陈腐的唯心史观,它的客观作用就是抵制和反对广大哲学史工作者认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认真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于哲学史的研究。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统一我们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阶级本质的认识,提高我们哲学史作品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水平,我们必须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展开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大力批判“四人帮”控制的报刊上所散布的诸如“政治思想决定论”之类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方法论的谬论。

(上接第 13 页)此外,为了综合考察固定资本投入各部门后所发挥的作用,还必须计算单位产品的固定资本占用额和固定资本消耗额。从长期看,这两种指标数值的下降趋势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的反映。总之,衡量固定资本投资的效果,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它不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研究固定资本投资的方针和方向所必须具体考虑的问题。

本文对美国官方编制的战后美国企业固定投资统计资料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所涉及的与固定资本投资有关的问题很不全面、所得出的若干结论也是初步的,尚待进一步用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加以论证。总之,本文只是作为研究美国固定资本投资问题的一个起点而已。